



让历史烛照现实

■文张卫

观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革命者》，记忆的闸门一下闪回到1999年，当时我受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指派，出任总编导兼制片人主任拍摄了文献专题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献礼党的八十岁生日。有幸到北京三里河李葆华家中采访了92岁高龄的葆华先生，听他动情地唱起《青春》这首老歌……我们的专题片在河北电视台四个频道(当时只有四个频道)滚动播出。该片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篇纪录片三等奖、第六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特别奖。我们也总结了三点体会：一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二是要实事求是讲学术(史实)，三是要精益求精讲艺术。

2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走进电影院，面对《革命者》这样一部用历史烛照现实、用艺术典型呈现历史伟人“人”的形象的史诗电影时，我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一是我将以一名“有资格的观众”来检验影片的艺术水准；二是我又是带有功利目的的“特殊观众”，观影后要写影评片观后感；三是李大钊是河北人、由河北省参与拍摄的电影，作为“河北的观众”一定要去努力发现“熟悉事件中的陌生风景”。两个多小时的观影体验，特别是现场分享到监制管虎、导演徐展雄、制片人梁静真诚的创作感言，我的内心被深深激荡，思如泉涌，回家急记之。主要有三点体会：

主旋律影片的叙事革命，商业大片的结构品质

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推动工人运动，倡导和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启发青年毛泽东深入农村基层，重视革命武装等方面作出划时代、开创性、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要以一部人物传记电影的体量，是很难全面、生动、深刻地去浓缩其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的。

影片编导匠心独运，用李大钊牺牲前38小时的时空限定，一反常规人物传记影片线性表现手法，用多个主观视角平行并叙叙事结构，以蒙太奇电影手法将多种不同视角下的回忆片段统领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网络中。这种叙事结构的优点是，在特定艺术语境下，主人公于行刑前38小时的心理活动应该是异常复杂、丰富、浪漫而多彩的。在38小时的特定时空中，由此而引出的任何心理活动、人物回忆、场景回忆、情感回忆都是符合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而影片编导按照历史逻辑选择的回忆片断不仅可以纵横捭阖，而且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在观影中，当我们发现、领悟、习惯了编导的这种叙事策略和叙述结构之后，便会瞬间觉出这种“形散神聚”的散文诗化表现方式的高妙奇绝。

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传记电影，一定要有“史实、史才、史德”。在管虎监制带领下，编剧团队和青年导演徐展雄、知名演员张颂文等主创团队，从“身入”生活到“心入”生活，再到完全“沉浸”于“真实史料范围里”，由此，对人物性格本质的把握，对李大钊先生精神的领悟，对影片主题的深化，对“信仰的力量”的笃信，对影片叙事结构的确立，以及对人物传记影片的风格化追求，都在“史实、史才、史德”中逐渐形成。河北籍导演高群书观影之后曾这样评价，“监制管虎和导演徐展雄的结合非常融洽，表里合一，兼具两个人的优点，既大气磅礴又细腻如诗。不易。”

彰显“信仰的力量”，艺术还原真实的“人”

真善美是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追求的至境。莎士比亚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概括自己全部艺术的经验，“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化成不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三合一，产生瑰丽的形象。”

该片导演徐展雄在和观众交流创作体会时说，“我只追求一个‘真’字”。其实，他要表达的思想是在电影创作中倾力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编导演、摄影美、服化道，以及剪辑和音乐等各部门都要求严格遵循和追求这一“求真”的美学原则。监制管虎在深刻理解了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信仰者、践行者之后，便努力在影片中去艺术还原“这一个”(黑格尔语)“尊重信仰的力量”的“人”。

根据角色需要选对了演员，影片基本上已成功了一半。而饰演李大钊的演员张颂文不负众望，他以“成魔”的那种态度，沉浸于对李大钊先生的钻研与生命体认之中，即使在实拍过程中，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真实表现。因而，许多观众，也包括演艺界的同行，盛赞其用心用功、倾情倾力、精妙准确如“教科书级的表演”。对于张颂文这样的好演员，监制管虎和导演徐展雄非常尊重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避免将人物塑造符号化，一定要“把李大钊演成一个‘人’”。

在影片独特的叙事美学中，李大钊作为“人”的多重侧面、多种身份、多个社会角色，在实际拍摄中，如何精准把握？张颂文坦陈也遇到不少困惑，比如李大钊救助过的穷苦少年庆子，化妆潜入牢房中来营救他，而他却把个人生死、家庭安危置之度外，坦然放弃一线求生的可能性。不仅庆子不理解，演员感困惑，观众也可能难以接受。但是，当张颂文在拍戏过程中，逐渐走入人物的内心，在跟其家人、朋友、学生的不断相处中，使之逐渐理解了李大钊“精神的可贵和人格的高尚”。

而这一切皆来自于“信仰的力量”。“就像李大钊先生说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他知道，自己的牺牲能换来更多人的奋不顾身，他的牺牲，能把黑暗撕破，后来者就可以继续革命。”张颂文毅然决然地相信了，“李大钊就是这样的，宁愿用自己的死，换来所有人期盼的光明。”正如一些网友所评，“因为相信，所以顽强；因为有信仰，所以有力量。”

让历史烛照现实，让青春更加壮丽

《革命者》从始至终昂扬着强烈的青春意识。以独特的叙事手法不仅展现出了一个富有层次、一步步觉醒、从爱国者，到播火者，再到革命者，最后毅然成为坚守初心使命的殉道者的伟大壮丽的一生，同时还用了大量琐碎的生活片段，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教师、读书人、父亲、丈夫、青年人的良师益友等平凡人的一面。

导演徐展雄说，“李大钊用他的信念去感化了无数人，感化了很多他身边的同志，感化了下一代的革命者。”影片中在李大钊身边聚集了众多年轻人，青年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从李大钊先生言传身教中悟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我们要不负革命先辈的重托，在李大钊精神烛照下，活出新时代更加壮丽的青春！

(作者为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河北传媒学院二级教授)

《1921》：精神生命的历史还原与作者个性的创新显现

■文张卫

看到青年演员王俊凯和刘昊然饰演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和刘仁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数字：28，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一群20多岁的小伙子，那是一个多么鲜嫩，多么生机勃勃的生命阶段！而我们对一大代表的想象是建立在对党百年历史认识经验之上的，我们在一百年来经过无数次熏陶、洗礼之后，往往不自觉地吧年轻的一大代表与久经风雨、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成熟坚定、经验丰富、高瞻远瞩叠印在一起，我们常常以当下的经验想象历史，以史论的规则想象历史，以话语的定势想象历史，忽略了一百年前的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数像1997年出生的刘昊然和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这般年纪。

党史对1921年的建党叙述必然是概括的、精炼的、抽象的，这种概括常常让人含混地感觉到历史叙述中的人物是老练且经验丰富的，从而忘记了他们生命的年轻，青春的似火。我问黄建新，你是要在《1921》里重新发现一大代表的年轻生命吗？黄建新回答：他们本来就是那样！于是我们在《1921》中首先看到了一大代表本来就具有的生命激情和灵魂激荡，这是对一大代表的生命还原：黄轩扮演的李达看到从楼梯上走下来的美丽“女神”王会悟(倪妮饰演)两眼放光；杨开慧(周也饰演)在送别毛泽东(王仁君饰演)时喊着“润之哥”，在阴雨绵绵中的四目相对是那样的依依不舍；邓恩铭他们在宿舍里兴奋地高声谈论五四运动火烧曹公馆的勇敢壮举，谈累了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此时，缓缓移动的长镜头镜头里出现桌上大盆的面条被吃得见底，上床下床的年轻生命以各种姿态在酣睡……我在农村插队劳动时，农民们用“吃不饱的肚子，睡不够的觉”形容我们知识青年的生命状态，编导就是在这样还原年轻的生命，明天这些小青年们还要去上海大世界看哈哈镜呢！

然而，编导所要还原的不仅是物质生命的年轻，更是他们的精神生命的年轻。导演黄建新说：“他们眼神很纯粹，具有一致性的纯粹。在拍摄《1921》的时候，我们决定选角一定要看到这张脸，就是这张脸上的纯粹。片中五四运动有场戏原本是安排由群众演员来完成，但试拍后发现总少了点什么，他们缺乏眼神中的‘一致性’”(《齐鲁晚报》2021年6月15日)。

于是编导精心选择了青年师生脸上才有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纯粹：李大钊(李晨饰演)带着大群学生迎接陈独秀出狱时具有这种纯粹；陈独秀(陈坤饰演)与毛泽东讨论《新青年》时具有这种纯粹；毛泽东与何叔衡(张颂文饰演)在湖南讨论农民运动时具有这种纯粹；李达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送到印刷厂，强调把稿中的“百姓”一词改成“人民”时具有这种纯粹；一大代表在会前辩论党的纲领时具有这种纯粹；在会议结束之后，不约而同地接句朗诵《共产党宣言》时正是这种纯粹。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眼神里放射的是精神之光。这是编导对一大代表精神生命的历史还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一大代表心灵的真诚触摸(《新晚报》2021年6月20日)。

正是这种精神生命的纯粹，一百年前的共产党人从不屈从于当时传统结构强加给青年学人的既定思维定势，为了破碎的山河和苦劳的大众，他们迫切寻找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真诚认识真理、自由辩论真理。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必须展开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刘仁静说农民运动是陈胜吴广，怎么能算无产阶级革命？！在寻找真理的过程，青年探索者们在争辩、在辩论，导演黄建新和郑大圣甚至用一个长镜头表现了那种犀利交锋的认真。我们久已没有看到这种表达观点的直率和辩论真理的真谛。

对精神生命的还原还表现在对情感生命的还原。黄轩扮演的李达对爱妻讲述火烧日货的情感经历：当自己划亮火柴企图点燃日货时，发现火柴也是日本造的，痛彻心扉的悲哀

使他泪流如注，此时此刻，倪妮饰演的王会悟也抱着丈夫的胳膊流泪。共同的精神境界使得这对夫妇的情感建立在同一泪点之上，这种志同道合的心心相印才使得他俩为了同样的精神归宿愿意赴汤蹈火。黄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部影片的核心是人，“每一个人都是无限丰富的。生命的过程是个最有意思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魅力是理论无法替代的(《齐鲁晚报新媒体》2021年6月15日)。”

精神生命的内在支柱是信仰，影片向我们呈现了一大之后共产党人的壮烈牺牲：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惨遭反动军阀绞杀，李汉俊1927年12月17日慷慨就义，邓恩铭1931年4月5日突对刑场，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在敌人的枪口前宁死不屈，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在突围中壮烈跳崖，陈潭秋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在《1921》中，信仰的表现不只是语言，更多的是热血！

为了凸显影片中的历史真实，《1921》还强力还原一大的真实环境：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一百年前上海的城市风貌和生活场景；编导不仅在上海市区街道的许多历史建筑群中实地取景，还在车墩影视基地专门建造复制了中共一大建筑群，包括渔阳里2号、望志路106号、博文女校、辅德里625号等建筑。

不仅建筑真实，道具也如是，印刷《共产党宣言》的那台印刷机，也是当年从上海废品厂收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古董”。这些建筑群和道具给编导拍摄提供了极大的真实感和自由度，环境的真实，使得演员的入戏更加自然，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更加真切。

黄建新和郑大圣都是艺术电影创作的著名探索者，但面对党史话语体系规定的应有逻辑和叙述走向，建党题材能不能创新、怎样创新，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黄建新认为，应该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管什么题材，都应有对原有程式套路的创新和对自己过去作品的突破。黄建新参与导演的《建党大业》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1921》则是一大大代表的心灵触摸和意识重现，从而还原当时共产党人的精神生命！

除此之外，还在时空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探索新路，编导打破时空的线性限制，设置了五四运动、建党、大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当下等多个时空，让叙事思路和人物情感在多个时空中来回穿梭，这种奇特的时空安排，不仅吻合90后、00后观众的想象力和穿越时空观，而且表达了一百年前的青年共产党人为了劳苦大众栉风沐雨、抛头洒血、走向光明的成长史，这是编导以激荡的脑力与观众进行着思维的互动……

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建党题材影片必须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为了牢牢抓住当下青少年的观赏注意力，编导采用了谍战片的类型叙述方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出发就被间谍机关监视，途径荷兰、香港直到上海，始终被特务跟踪，跟踪和反跟踪成为吸引观众视点的重要元素，秘密跟随马林的租界密探一直跟到一大会议后冲破暗哨王会悟的阻拦径直闯入会场，这一动作戏成为全片最揪心控诉的紧张点。与会代表意识到已经暴露，旋即飞奔下楼转移到嘉兴南湖，让前来抓捕的租界警队完全扑空，这一经典的谍战片情节竟然是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

对于电影美学，黄建新有自己的认知，他认为电影也是作者根据真实组合的现实，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就是指大事要绝对真实并且准确，小事则可根据创作的情感的逻辑放开创作。于是在片中我们看到影片中李达在桌前奋笔一夜，完成了党纲的编辑修改后，爬出阁楼的小窗，登上屋顶，伸开双臂高声呼喊，拥抱早霞，拥抱东升的旭日！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